**打动世界的伊朗电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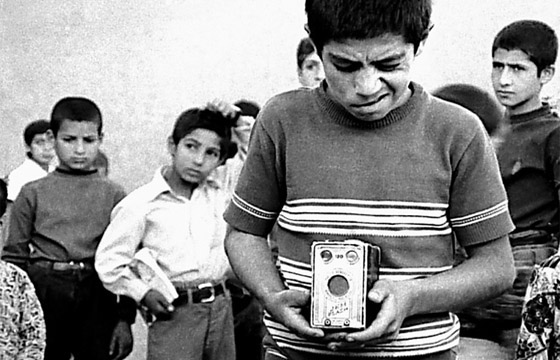


在过去的100多年里，伊朗电影人在禁锢与清规戒律下为世人呈现的伊朗图景，曾打动了无数人。如果要为伊朗电影获得过的国际奖项打造一个回廊，那必定绵延数百米且没有尽头。虽然在新世纪伊始的数年，它曾一度沉寂，然而，随着《一次别离》横扫柏林电影节、金球奖、伊朗电影再次征服世界，似乎预示着伊朗电影下一波新浪潮将起。

**大潮将起**



在过去25年里，伊朗电影曾获得过300个国际奖项，但伊朗电影的发展却远远不止25年。从1900年第一部为国王拍摄的起居片段，到奥瓦尼斯·奥哈尼安拍摄的第一部无声影片《阿比与拉比》，再到“伊朗有声电影之父”阿布杜尔·侯塞因·沙班达执导的第一部波斯语有声片《洛尔姑娘》，电影为伊朗这片土地开拓了一片充满希望的疆土。然而在这100多年的发展中，有一个时间节点却无法回避—1979年伊斯兰革命。革命前后，伊朗电影所展示的是截然不同的图景。革命前，国王的统治虽然暴戾，却为伊朗文化打开了一扇相对宽松的大门，而这种政策上的自由催生了上世纪60年代末伊朗电影所兴起的新浪潮运动。



其中，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便是佼佼者。1960年代末，阿巴斯组织成立了一个隶属于青少年知识和艺术教育机构的电影分部，这个分部后来聚集了伊朗最出色的导演，包括巴赫拉姆·拜札、礼萨·阿兰札德和索拉布·沙希·萨勒斯等等，阿巴斯的片长10分钟的处女作《面包和小巷》也由此诞生，这部作品简洁而极富趣味，让阿巴斯从此开启了电影的大门。4年之后，他执导的《过客》问世，片长只有72分钟，讲述一个热爱足球的孩子想方设法凑钱去德黑兰看球赛的故事；这部电影虽然并未走红，却影响了伊朗儿童电影此后的走向，其意义相当于特吕弗之于法国的《四百击》。



阿巴斯曾表示，与其用“压制”形容自己所处的环境，不如说是“限制”，尽管这些限制不能说是应该的，却是东方文化生活的一部分，“但正是有了限制，才让我们变得更有创造性，激发我们创立新的风格。”阿巴斯这么说。有着这样的意识，阿巴斯带领着无数的电影人做出了非常傲人的成绩，这股新浪潮是伊朗电影首次冲破国门的年代，作者导演索拉布·沙希·萨勒斯的“生命三部曲”《简单的事》、《静谧的生活》和《远离家园》，连续3年获得9项柏林电影节大奖，其中《静谧的生活》也是史上15部最佳伊朗电影之一，当年在柏林影展获得包括最佳影片在内的5项大奖，但是因为内容“敏感”的原因，却一直未能在伊朗本土上映。即便如此，新浪潮对于伊朗电影工业的影响是如此深刻而悠远。

**审查阴影**

这股新浪潮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1979年，一切都改变了。这一年，注定是所有伊朗人将铭记一生的时刻。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革命，一举推翻了伊朗的沙赫国王。革命后，电影被认为是一种腐化堕落的生活方式，导致电影环境极度恶劣，许多电影人面临着宗教和道德法令的审查，而新政府成立之后，也将电影当成社会宣教活动的工具，要求导演拍摄官方电影，无数充满创作欲的电影人都被迫流落海外。1980年代初，伊朗导演在严格的制约下拍摄了一批以宣扬伊斯兰文明、抵制帝国主义为主题的电影。当时的伊朗电影里禁止出现紧身的女性服饰，除了脸和手以外其他女性部位不得裸露；男女之间不得有身体接触和暧昧的语言笑话（因此在电影中，夫妇之间戴着面纱入睡是十分寻常的画面）；军队、警察或家庭的笑话不得出现；长胡子的反面角色不得出现；外语和粗鲁的语言不得出现；不得有外国音乐或其它欢快的音乐等等。

这些严苛得不像话的戒条，使得当时的伊朗电影人只能在儿童电影题材上下手，拍摄了一系列经典儿童影片。而十分讽刺的是，伊朗电影因儿童电影最受国际瞩目的那几年却是审查最严格的年代，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不幸，又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荣幸。带着夹缝求生的电影意识，师从阿巴斯的贾法·帕纳西在《白气球》这部具代表性的儿童电影后又拍出了《谁能带我回家》，努力探索电影叙事手法上最新鲜的表达形式，音画之间的互动极具特色。这部构思精巧绝妙的电影又在1997年的瑞士洛加诺电影节和纽约影评人协会上夺得大奖。

在这个历史时期，帕纳西成为了伊朗电影的领军人物。与对政治并不热心的阿巴斯相比，帕纳西已不满足于仅仅以拍摄儿童电影来反映伊朗现实。2000年，他拍摄的《生命的圆圈》让影评人震惊，它通过7个伊朗都市女性一天生活经历的交接，拼接出一个宿命的轮回之圈，触碰了伊朗电影人迟迟不敢触碰的妇女题材。该片获得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费比西国际影评人奖、圣赛巴斯蒂安电影节费比西年度电影奖等等。

然而，帕纳西的勇气并未让他得到伊朗有关方面的赏识。2009年的伊朗总统选举中，支持自由派竞选人的帕纳西因为“在家中私自拍摄电影”的罪名遭到逮捕，不但获刑6年，还被处以禁拍电影20年的惩罚。被拘禁后，帕纳西在庭上的讲话被广为传扬：“我爱这个国家，也已经为了这份爱付出了代价，但如果必要的话，我愿意再次付出代价。此外，我还要严正声明，正如我电影中所呈现的，我信奉的是‘他人’拥有不同观点的权利，我信奉的是人与人的互相理解、互相尊重，乃至互相宽容。”

**等待放晴**



此后的许多年，虽然伊朗电影工业每年仍旧有一百多部的影片产量，但这些电影却并不为外国所了解。这些电影多为商业影片，与常在国际舞台亮相的艺术电影有所不同。这些电影大多分为两类—一类是有关1979年伊斯兰革命及两伊战争主题的影片，充斥着强烈的宗教意识及民族色彩；另一类则是有大明星参与的俗套影片，通常是喜剧、浪漫爱情片、亲情剧，像每年赢得伊朗最高票房的大体是《停火》、《杀死疯狗》、《像妈妈一样》这类影片。

由于审查原因，好莱坞电影也不能大批进入伊朗国内电影市场，能进入的如《史密斯夫妇》都要接受严格的剪辑及修改，譬如安吉丽娜·朱莉在影片中所穿的性感服饰就被伊朗电影工作者“偷换”成长长的黑色半袖T恤。而有时在大多数的好莱坞影片中，情侣关系都要改成兄妹关系，前任男友改为大哥，现任男友则变成二哥，所有的亲热镜头也一概都被删去，台词里如果出现了“我爱你”，就换成“多保重”。在这种氛围下，艺术电影工作者的工作便更加慎重而艰难。2003年，导演巴巴克·帕亚米在伊朗东部山上拍摄他的第三部电影《思维有别》，这部电影将会参加威尼斯电影节。就在工作即将结束的时候，便衣警探在街上逮捕了帕亚米，把他关进监狱，他的办公室也突然遭遇搜查。伊朗文化部强烈要求他放弃这部电影，幸运的是，帕亚米在意大利的工作室中还有另一个版本，因此还是能将影片送到电影节上。

这样的例子多不胜数。然而，你又不能不看到一些希望—在伊朗，分支机构遍布伊朗的民间电影组织“伊朗青年电影协会”在短短十多年间就培训了数以万计的电影人才。而伊朗的平民电影学校也是全世界最多的，就以纯家庭作坊式的“马克马巴夫电影之家”为例，由马克马巴夫一手创办的电影学校，校舍就是他的家，老师是他自己，学生就是他的妻儿及其他有志从事电影行当的年轻人，这个家庭电影作坊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导演和从影人员，佳作迭出。而且，妇女在各方面受到限制，可是学习电影毫无限制。所以，伊朗有大量的妇女导演，如泰米妮·米兰妮、汉娜·马克马尔巴夫、玛嘉·莎塔琵等等，而她们又是下一代最好的启蒙者。

尽管审查严格，但总有愿意为电影付出心力的年轻人，谁能预料伊朗会不会出现下一个阿巴斯和帕纳西？毕竟这次在金球奖及柏林电影节大放异彩的《一次别离》的导演阿斯哈·法哈蒂才37岁而已。法哈蒂曾说过：“伊朗的电影审查就像英国的天气，这一秒是晴天，下一秒便下雨了。你能做的便是期盼放晴而已。”如今，或许也只是伊朗电影的雨季，《一次别离》的获奖，便可以看成是放晴前透过阴霾的那一缕阳光。